

唐宋八大家传 ③

欧阳修传

陈
铭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传 (5)

欧阳修传

陈铭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阳修传/陈铭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9
(唐宋八大家传; 3)
ISBN 7-5361-2125-3

I. 欧… II. 陈… III. 欧阳修-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8740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广州大道北广州体院內 20 栋)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 插页 174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15.00 元

《唐宋八大家传》总序

唐宋八大家者，唐宋文坛之八颗巨星也。稍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人都晓得他们就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及曾巩。“八大家”之称，虽然晚至明代才提出，但他们在活着的当时，已拥有浩浩荡荡的追随者，对后世的影响更是无法准确估量，关于八大家的研究文章和著作真可谓卷帙如山了。

如今继续啃死人骨头？还有味道么？至少我们认为，答案是不宜简单否定的。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我们曾目睹过不少伤筋折骨者，据给予治愈的杏林高手透露，那主治的丹方中就用了枯骨所研成的细末。啃死人骨头的目的，理应是为了活人。世易时移，活人的病变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枯骨何以更有效地治疗今疾？这就存在着继续研磨的需要。

文章最忌随人后，著述从来贵创新。赶时髦并不意味着创新。不知始于何时，“运动”一词时髦起来。在那不断地运动群众的年代，“运动”更是时髦得很，以致我们的一些学者也趋附了，把八大家及其追随者在不同时代的分散努力也冠之以“唐宋古文运动”的名堂，髦得可爱。然而名实是否相符？本丛书有的著者就提出了新的见解。

往昔的论者，多用“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来概括八大家的文学主张，认定他们的宗旨是“复古”、“兴儒”。事实果真如

此吗？当然，八大家说过不少“志乎古道”、“文必与道俱”之类的话，但这“道”的实质，仅是古儒之道，乃至腐儒之道吗？不。“复古”、“兴儒”恐怕只是他们打出的旗帜，真正的目的乃是要摧毁那华而不实、束缚自由的骈俪文风，推动文学朝“言必近真”、“文从字顺”的方向革新。不然的话，他们的另一些更具影响力的至理名言将作何解释？“词必己出”，“古人亦人耳”，只宜“师其意，不师其辞”，“惟陈言之务去”云云。显然，他们是坚决反对拘泥古训、吃古不化的。

四人帮曾经鼓吹过臭名昭著的“帮八股”，其流毒虽被改革开放的大潮所荡涤，然而有些人，也许余悸在心，也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迄今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批评并未蔚成风气，动辄有“打棍子”、“扣帽子”之类的帽子飞来；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思维惯势，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准确评价。本丛书试图克服这种种偏向，尊重历史事实，扬善而不溢美，抑恶而不失真，还八大家的本来面目。所谓“八大家”，是个文学概念，因此，本丛书着重勾勒传主的文学家形象，即使是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也是如此。在此基础上，开拓新思路，从新时代的视角去观照八大家所走过的道路，挖掘他们最可宝贵的改革创新精神，探究他们成功的奥秘，为酿就新时代的新文风贡献绵力。这就是组编本丛书的终极目的。

“不泥古”、“不落套”既然是八大家的作风，本丛书也就不打算从体例、格调、篇幅等方面去强求死板的一致，以免形成新的俗套，束缚诸位著者学术专长的自由发挥。八大家中苏氏父子占了三家，为行文方便、避免重复起见，只好委屈“三苏”合为一卷，并非缘于粗制滥造或因陋就简。这是要向读者诸君特意说明的。另外，八大家中有三家出自江西，因此我们特约请江西籍

或长期在江西工作的学者、专家撰稿。他们出于对古代乡贤的仰慕，长年潜心研究，广泛搜集资料，充分利用地方文化的优势，相信他们是不会令读者失望的。

时代呼唤着新的文坛巨星，愿这小丛书伴随着众多的新星焕发光彩。

杨明新 何业光

1996年中秋于广州天河城

目 录

前 言	(1)
一 时代和家庭	(13)
二 科举的道路	(27)
三 洛阳交友与习文	(48)
四 第一次政坛论争	(61)
五 被贬到夷陵	(69)
六 重返京师政坛	(80)
七 受到无端的诬陷	(90)
八 陶陶然一个醉翁	(94)
九 颍州的优游生活	(102)
十 地方大员的活动	(110)
十一 进入中央政府	(118)
十二 主持科举考试	(134)
十三 在名臣的位置上	(149)
十四 又陷入政坛漩涡之中	(162)
十五 到亳州去做太守	(173)
十六 面对王安石的改革	(183)
十七 青州一年的苦乐	(192)
十八 最后一个官职	(199)

十九 退休后的生活 (209)

后记 (222)

前 言

历史学家研究指出，北宋建立之前的二百年左右时间，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出现封建割据的混乱时期。安史之乱把繁荣的大唐帝国拖向衰落，地方藩镇的分裂割据，使中央集权政府软弱无力。从开平元年（907）朱温灭唐建梁，又掀开了绵延五十余年的五代十国时期。王朝兴衰指顾间，小国存亡转瞬里，五个王朝，十个小王国先后杀伐混战，兴亡朝夕，使中原大地和广大汉族聚居的地区狼烟四起，盛唐以来积聚的物质财富和文化典籍，被摧毁得七零八落。

显德七年（960），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策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兵不血刃地夺取了政权，改国号为宋，开启了北宋王朝的历史。赵匡胤行伍出身，善于征战，很快制定了统一中国的政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经过近二十年的战争，才在太平兴国四年（979）结束了五代十国混乱分裂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大部。只是这个时候，赵匡胤已死，当皇帝的是他的弟弟赵匡义，史称宋太宗。从此，宋王朝便开始了经济建设的时期，创造了继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新高峰。在这个意义上，赵匡胤是有功绩的，《宋史》说北宋“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於汉唐盖无让焉”。北宋王朝承袭汉唐历史的积累，很快地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王朝。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

繁荣，欧阳修正是在这个走向繁荣的时代走进历史的，而他也在
这个转变时期，恰如其分地承担了文化承前启后的任务，使他成
为北宋文学之父。

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学之父，基于他全面而高度的文学成就，
也基于他文化人格的重大影响。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勾勒
这位北宋文学之父的面貌。

第一方面，欧阳修全面地开拓了宋代文学新的风气。这个风
气包括了文学扩大的内涵、风格、语言和社会功能等方面。

首先当然是古文，实则是以较为平实较接近口语的文言文去
议论、叙事、抒情。在文学史上，欧阳修往往被列入古文唐宋八
大家而著称。应当承认，复兴先秦时期鲜活有力的古文，韩愈有
不世之功。所以，苏轼在《居士集序》中说，自汉以来，“五百
余年而后得韩愈……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唐之
韩愈与宋之欧阳修，都是古文复兴的一代功臣。欧阳修是在宋代
古文写作开山作者石介、柳开等人揭示新文风开始进入文坛的。
但欧阳修的古文，起点却超越石介、柳开，直接与韩愈接轨。欧
阳修古文以明道与宗唐入手，又结合北宋文化普遍性和世俗化的
氛围，创造性地把抽象的明道，寓于具象的抒述之中；把申述儒
家最高理想，贯于日常社会现象之中。因此，欧阳修的古文，重
应用切实，重以情感人，重自然畅达。鉴于中国汉语发展上，语
言和文言分离的现实，距古愈远，语与文分离越甚。宋代的文言
与口语，比之唐代差异更大，我们从今日见到的口语化的话本小
说，与文士的高头讲章相较，就可明了。因此，欧阳修在韩愈深
奥与平易两种文风中，推崇的是平易的文从字顺，这显然是符合
当时语言发展状况的。欧阳修还在古文中应用了近乎口语的词汇
句式，极少用典，极少用生僻词字，也是基于北宋社会的语言状
况。另一方面，欧阳修是个重情的人，笔端常带感情，因此，他

的古文寓理于情，以情动人，使一些言事说理的文字，也很有感情色彩。明道的内涵，化解在委婉情致之中，古文就更有感染力。宋以后古文散文寓理于情，寓情于（物）象的传统，无疑有欧阳修开拓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古代古文发展史上，推举欧阳修为北宋第一人，是恰当的。

欧阳修的诗名不如文名之大，部分的原因是，与欧阳修同时期的两位老朋友苏舜钦和梅尧臣，在诗歌创作方面有更大的创获。但是，欧阳修对宋诗的贡献，却是苏、梅所不及的，便是奠定了宋诗深远闲淡的方向。所谓深远，就是诗中具有哲理趣味，“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所谓闲淡，就是风格闲适，语言平易，既不艰晦，亦不浅俗。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我国诗论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形式评论诗歌的集子，开诗论中诗话一体，影响深远。宋人论诗的热情，超迈历史上以诗著称的唐，更无论秦汉了。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上并非弱手，八百多首诗，各体兼备，内容丰富，可与苏、梅并驾。因此，开拓有宋一代诗风，欧阳修是先行者。

欧阳修的词，在北宋时为人称道不多，甚至有人认为，欧阳修的词亦有鄙亵之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从卫道角度去保护欧阳修。欧阳修的门人苏轼，在概括乃师成就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竟不涉及词。这是有原因的，主要是五代以来，词是作为歌宴侑酒之曲，声节缓慢柔媚，叙写男女恋情，被目为小道，为艳科，士大夫偶有所作，也常是随兴之笔，甚至晚年編集不收词作。北宋初年，大臣巨公大多填词，而词的内容，多数不出《花间》柔婉的抒情路子。欧阳修在这个文学氛围中参加填词，自己又是个用情之人，所以许多词作，仍然在男女恋情内兜圈子，是不奇怪的。但是，作为一代文学开拓者，他的创造性也在词作中凸现出来。直到近

代词学家回顾宋词源流衍变，宏观其脉络，才比较明白地看出欧阳修词对词一体发展的重要意义。冯煦在《宋六十家词选例言》中就说：“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本传云：‘超然独骖，众莫能及。’独其文乎哉？独其文乎哉？”这倒是词学理论家冷静的评价。欧阳修的词作，相当部分是《花间》路子，无庸讳言。即使章法的严谨，语言的流畅，修辞的巧妙，亦是为婉约情词服务的。欧阳修词对于宋词的贡献，主要有三类作品，具有先导意义。第一类为述怀词，在词中结合个人身世升沉，直抒胸臆，把诗歌中的述怀一类，直接移到词作里，摆脱了词只供侑酒行乐的局限，而赋予词作个体生命与社会内涵。《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等作，都有鲜明的自我形象。词从五代大多数作品的恋情共性，延伸到词人的个性体现，词创作就可跳出共同主题的小圈子，走向丰富性。第二类为即景词。诗有即景题诗，词也当有即景填词。欧阳修的即景填词，最为明显的特点，一是结合自身感悟，一是数首或十首成编，连续吟唱。号称“西湖念语”的《采桑子》十三首，是欧阳修退仕回到颍州西湖居处所作。西湖的景状物态，与作者的心绪变化，都化入一幅幅具象鲜明的画图之中。这些作品，无疑也扩大了词的容量。最后第三类作品，是开拓一种豪洒的词风，把歌宴席上曼声柔唱的词，带到金戈铁马的壮伟场面上。这一点，欧阳修的师友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已经开其端了。欧阳修的《渔家傲》（十二月鼓子词）分别吟唱一月至十二月各月的活动，既有浓郁的民俗气息，更摆脱柔婉凄丽的束缚，显示一种豪洒超迈的艺术风格，为以后苏轼的豪放词作了先导。至于欧阳修词中极重视炼句，已成宋词特色。宋词中一些名句，如“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衣

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等等，它们所结构的意象，有很大的思绪容量，已被后代人们不断重现在诗作词作中。与欧阳修同时有著名词人张先、晏殊等，稍后则大家如群星灿烂，不免使欧阳修词名受到掩抑。我们检点欧词，把它们放到宋词发展的链条上审视，就会感到，欧阳修在词创作方面，无疑起了承先启后的开拓作用。

欧阳修在古文、诗歌、词的写作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使他在11世纪上半叶的文坛上，居于领袖地位，已是当时文坛的共识。随着时间推移，欧阳修文学创作的先导意义，人们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了。

第二方面，欧阳修树立一种学者化的全面发展的文化人的典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人们追慕的人物。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就是说，中国封建文明的极盛，是宋代，更准确地说，是北宋。北宋文化全面的繁荣和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化普及等历史条件分不开。这个时代出现的文化人，就不仅仅是在某一方面有特殊成就的人物。就个体而言，他具有全面的文化修养，各方面均有高度的成就，集学者、政治家、诗人、古文家、词人于一身。在11世纪上半叶，欧阳修可说是一个代表，有楷模意义。欧阳修不只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文化人。在政治上他做到参知政事，直接参与政坛中枢的运作，两次柄文衡大权，选贤荐才；他在文学各体的创作上，取得很高的成就；他是学者，探研经学、史学，有骄人业绩；他是艺术鉴赏家，对书道、图画、音乐有独到见解；他还是金石学家，考订论析大量碑帖，究其源流。甚至药物的使用，茶酒的品评，亦有灼见。这里只就经学和史学上的成绩，概述一下欧阳修

作为学者的意义。

经学发展至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宋人解经，以阐发自己的理解为主，摒弃汉儒字斟句酌的束缚，形成经学中的宋学一派。欧阳修有《诗本义》16卷，以及大量论述经学的文章。他在《本末论》中提出：“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就是说，只求经籍上训诂考订，是经学之末，而阐述诗人之意、圣人之志，是经学之本。其实，欧阳修也明白，毛公《诗诂训传》和郑玄《毛诗传笺》，无非是汉人以解《诗经》来表述他们对当代社会思想制度的臧否。欧阳修强调要体会《诗经》“诗人之意”，更多从接受学的角度，站在宋代的历史阶段，对《诗经》重新认识。欧阳修的阐释，当然也有谬误，但他振兴了一种疑经惑传的风气。以怀疑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前代学者的著作，作出新的判断，树立新的诠释，这便是宋学给学坛带来的新风气。欧阳修在其中起积极作用。

欧阳修还有《易童子问》3卷，《春秋论》和《春秋或问》等，都是批评在经学研究中各种不切实的说的。欧阳修不算是个经学家，他的经学研究无非表明：他积极推进宋代疑古创新的经学思潮的成熟。他的研究成绩表明他是一个有眼光有水平的学者。

作为学者素质的体现，更多在史学研究上。欧阳修尊重历史，多年认真钻研，著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书》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还有大量历史评论。欧阳修史学著作的得失，自有史学界的评论，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欧阳修的史学著作，一直受到重视。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以“欧史书法谨严”评论道：“不阅《旧唐书》，不知《新唐书》之综核也；不阅薛史，不知欧史之简严也。欧史不唯文章洁净，直

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这个评价可谓高矣，现在看来，欧阳修的褒贬，未必都是恰当的。但是，这恰恰表达了宋人对以前历史的认识，所以欧阳修自己说所修的《新五代史》是“乱世之书”。欧阳修撰述史学著作，并非个人的行为，而是宋代的学风，即为政者修史，显示文化的全面发展。在史学著作中，欧阳修不仅收集编整巨量历史资料，而且在体例、表述、语言、章法等方面，亦有新的尝试。人们从欧阳修大量史学著作中不难看出，欧阳修是一个值得敬重的学者。

欧阳修是一个知识渊博又勤奋好学的学者。他嗜好收集碑帖铭文，从庆历五年（1045）至嘉祐七年（1062）近二十年间，收集千卷，编成《集古录》，同时在所收的碑帖铭文之后，写下自己的考订、评论、品鉴、溯源各方面的意见，成《集古录跋尾》，今存十卷，四百余篇。欧阳修不是古董商，他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去收集古代碑铭的，所以他的收集和他的史学、文学和书学的探究，直接发生联系。他用地上或地下发掘出的碑铭材料，订证史实，纠误改错，拾遗补缺。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新唐书》，也得益于他所收集的碑帖铭文。把收集碑铭当作一门学问，并贯通到自己的著作中去，在宋代以前是很少的，欧阳修是开风气人物之一，故而朱熹大为赞叹，认为“集录金石，于古初无，盖自欧阳文忠公始”。朱熹评价未免有溢美之嫌，因为前人已有集录金石的活动，只是没有像欧阳修那样，把集录金石与著述史书结合起来。不过，以欧阳修的盛名而集录金石，在北宋无疑起推波助澜作用。尔后洪适、曾宏父、吕大临、薛尚功、赵明诚诸人，也大量集录古代金石碑刻，使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金石学，蓬勃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中重要的部分。

欧阳修留心家乡文献、家族承传，他撰《欧阳氏谱图》实为

方志学中族谱一种，别亲疏，分繁简，清楚实用，为后人所仿效。

欧阳修还是个艺术鉴赏家。他对书法、音乐、美术有很高的鉴赏力。欧阳修推崇唐代书法，特别称许颜真卿。说：“自唐末干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宋兴，百年之间，雄文硕儒，比肩而出，独字学久而不振，未能比踪唐之人，余每以为恨。”（《集古录跋尾》卷四）这是他对当时书坛的判断，无疑是对宋代书法发展的激励。北宋书坛四大家苏轼、米芾、黄庭坚和蔡襄，成名都由欧阳修之后，书法又都由唐代颜真卿书法演变而来，这里当然有欧阳修鼓励宣扬的影响。欧阳修评论书法，常把时代气氛与书法特点联系起来，特别是把士人（书者）的人格与书法的品格合而观之，说南朝士人气尚卑弱，所以书法以纤劲清媚为工；说唐代强盛，人字皆不俗，尤以楷书及行草特佳。这些评论，大抵符合书法发展的历史。欧阳修自己书学颜鲁公，工整秀丽，虽然自谦“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但实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宋代书坛四大家之首的苏轼，是这样评价老师的字的：“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型，庶几如见其人者。正使不工，犹当传宝，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重要的是，欧阳修的书学，已为当时士人尊为学者仪型，可见影响之巨。至于音乐、美术方面的鉴赏力，我们可从他诗文对听乐观画的刻画中见出，此处不赘。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谱牒学、书学乃至音乐、美术各方面深湛的学识和渊博的修养，证明他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全面发展、有多方面贡献的学者型的文化人。正是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积淀，到宋代应是出现封建文化极致的时代，也是出现具有文化全才的新一代文化人的时代。这种文化全才式的文化人在北宋出现，欧阳修是第一人。他的出

现，无疑推导了一种积极的文化风尚。从北宋开始，文化人都力求在文化各方面发展，也涌现如苏轼、王安石、黄庭坚、司马光等一大批全才式的文化士人，全面地推进古代封建文化的繁荣。在这个意义上，宋代显然超过唐代，而欧阳修作为北宋第一人，尤其值得称赞。

第三方面，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坛领袖，始终坚持在一个璀璨的星座之中居于最明亮的一颗星的位置。就是说，在北宋文化改革，树立一代有特色文化的过程中，欧阳修起着重大的团结、组织、扶持、培养的作用，把同年龄一代文士，与晚辈一代文士，都集合到文化改革（包括古文复兴）的潮流中，形成巨大的意识力量。欧阳修从踏入仕途，到洛阳为官的时候，就深感文化思潮必须要有一伙志同道合的朋友推动。当时钱惟演以宽容的胸怀和重才的见识，团结了大批有才能有志气的青年文士，对宋代古文复兴起很好的作用。欧阳修初出茅庐，即在这个文化氛围中，很快形成古文与诗歌写作的新观念新手法。所以，当欧阳修一旦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他就尽可能团结更多的文士，权力越大，团结越广。

在欧阳修的周围，有许多在北宋政坛、文坛上曾起过较大影响的人物。即如在洛阳时期，青年欧阳修就结交了诗友梅尧臣、苏舜钦，文友谢绛、尹洙、石介、穆修、尹源、富弼、王复、杨愈；词友张先等。这些人日后几十年间，大都成为欧阳修诗文书新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庆历新政时期，欧阳修以其坚定的改革精神，赢得一批政坛师友。他曾荐举余靖、王素、蔡襄等任谏官，又与中枢首辅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结成政治同盟，即便遭贬谪，友情不失，而且形成改革诗文的重要力量。庆历新政失败后十年，欧阳修重返京师任翰林学士，当时富弼、包拯、胡宿也回到京师任职，士大夫深庆朝廷得人，称这四个人为“四